

農村市場問題

方天白編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編 者 的 話

一九五三年國家開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糧食、油料實行了統購統銷，以及大力開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以來，農村經濟生活和城鄉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集中地表現在農村市場問題上面。

這個小冊子，從分析農村經濟生活的基本情況開始，敘述了兩年來農村市場發展變化的各個方面，用一些具體事實，證明廣大農村正是生氣勃勃地朝着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所指引的方向大踏步前進，城鄉關係和工農聯盟也隨着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發展而進一步加強與鞏固了，這也就證明許多關於農村市場問題的片面看法是沒有根據的。同時本書也客觀地分析了農村經濟生活和城鄉交流劇烈變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以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經驗教訓，並指出改進今後農村市場工作的途徑和辦法。

農村市場是農村經濟的中心，是城鄉交流和結合工農業生產的橋樑，特別在以農產品為首的許多商品供不應求的今天，農村市場工作的好壞，更是直接關係着廣大城鄉人民的生活、國家工業化建設事業和工農聯盟的鞏固。大家應該重視並做好農村市場工作。

這個小冊子是根據某些調查報告以及中央有關財經工作指示的基本精神編寫的。適合於當前縣區級黨政幹部、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工作者以及關心農村問題的同志閱讀和參考。

目 錄

过渡時期農村市場的重要意義·····	1
農村經濟生活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向前發展·····	6
農村裏的新問題——“供不應求”·····	11
城鄉物資交流和農村商業網發生了劇烈變化·····	17
小農經濟與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之間的矛盾·····	22
怎樣解決農村市場“供不應求”問題·····	27
合理安排農村中的各種商業·····	36
加強農民切身經濟問題的思想教育·····	42
做好農村市場工作進一步為國家工業化建設事業服務·····	50

过渡時期農村市場的重要意義

我國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業的進程表明，農村市場的重要意義已經与日俱增。現在，大家对有關農村市場的問題，如糧食、油料的統購統銷，統購統銷後農民經濟生活的變化，城鄉物資交流和農村市場的改組，農村私商的安排和改造，小農經濟和國家工業化建設之間的矛盾，許多商品的供不應求，國家工業化時期如何滿足農民生產、生活上的要求，以及怎樣進一步結合工農業生產和鞏固工農聯盟等等，已經一天比一天更加重視起來。

農村市場在过渡時期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

一、小農經濟落後的生產力趕不上國家工業化建設的需要，農產品不足的局面，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繼續存在，而農村市場是農產品的採購基地。

我國自一九五三年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以來，由於工業和城市發展，增加了糧食和副食品及工業原料的需要量；同時，為了到國外交換工業化建設的必需的機器裝備，又需要儘可能地組織農產品出口；而廣大農民在幾年來生活改善的基礎上，對各種農產品的消費也大大增加；因而國內市場首先出現了糧食、油料、豬肉等主副食品供應緊張，及棉花、菸葉、麻類等工業原料和其他許多出口的農副產品貨源不足的局面。農

產品是每個人民所必需的主食和副食品，又是工業生產的重要原料（目前我國全部工業產品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以農產品為原料的），也是出口物資的主要貨源（雖然國家對人民所必需的糧食、油料是限制出口的，但目前我國出口物資中，主要還是農產品）；如果國家不掌握必要數量的農產品，就會影響人民生活、工業生產和市場物價的穩定，妨礙國家工業化建設的順利進行。但落後分散的小農經濟趕不上國民經濟高漲的需要，這種小農經濟落後的生產力與國家工業化建設的矛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將會繼續存在，因此，國家必須加強農產品的收購和分配工作，並用各種方法促進農業增產，以適應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需要。農村市場是農產品的採購基地，擔負着進一步加強今後農產品貨源的組織工作並加以合理分配的重大責任。這樣，就大大加重了國家工業化建設時期農村市場的重要意義。

二、在國家工業化時期，日用工業品的生產趕不上人民購買力的增長，而農村市場是工業品的主要銷地。

由於國家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以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同時也由於農業原料不足，使許多輕工業品的增產受到了限制；因而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國日用工業品的生產是趕不上人民購買力的增長的。農民佔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是日用工業品的主要消費者，而且農民購買力的增長速度又超過城市人民很多（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城市職工工資增長百分之三十三，而農民購買力增長則將達一倍），他們希望多購買工業品的要

求比城市人民更加迫切，因此，今後農村市場日用工業品供不应求的形勢，必然会表現得比較尖銳。如果農村工業品供应工作做得不好，就会影响農民生產和生活上的需要，就会影响農民按計劃生產和出售農產品，就会增加國家對農產品收購工作中的困难，進而影响城市供应和出口任務的完成，並威脅到市場物價的穩定。爲了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穩定市場物價，今後農村市場必須加強對農民需要的調查研究，做好農村工業品供应工作，尽一切方法努力滿足農民生產、生活上的需要。這也就加重了農村市場工作的重要意義。

三、在過渡時期內，要建立社會主義類型的農村市場，以加強社會主義經濟對城鄉關係和農村經濟的領導地位。

糧食、油料、棉花、棉布統購統銷政策實施以後，社會主義的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掌握了全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的貨源，佔領了市場的絕對領導優勢，縮小了自由市場，城鄉市場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城鄉資本主義的聯繫被大大削弱了，農村市場私商從過去向城市批發商進貨轉而向當地國營公司和供銷合作社進貨，使城鄉交流的渠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農民也從與私商交易而轉向與國營公司和供銷合作社交易，使農村商業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商業對農村市場的領導地位，如何對農村市場私商進行安排與改造，如何在新的情況下進一步發展城鄉交流，加強工農業生產的結合，如何合理佈置與改進農村的商業網，便利農民買賣，如何加強各方面的工作，以建立社會主義類型的農村市場等問題，就成爲今後農村市場迫切需要解決的繁重任務。

四、農村市場工作對促進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許多商品供不應求的形勢下，為了保證供應和穩定物價，防止私商投機操縱和小商品生產者的囤積惜售，國家對主要工農業產品實行了統購統銷政策。廣大農民是農產品的生產者（當然也是農產品的消費者），又是日用工業品的主要消費者，統購統銷政策改變了農民千百年來自由買賣的習慣，削弱了農民和私商的聯繫，限制了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發展，加強了農民與社會主義經濟的聯繫，把農民經濟生活進一步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有力地推動着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開展，促使農民迅速走向集體制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大道。因而農村市場工作已經成為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助手。

總之，過渡時期的農村市場工作，對國家工業化建設事業，對廣大城鄉人民的生活，對工農業生產和城鄉交流，對全國市場物價的穩定，對社會主義經濟的領導地位 and 對廣大農村私商的安排與改造，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對工農聯盟的鞏固都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是繁重的經濟工作，也是重要的政治任務。

毛主席曾經指出：“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体。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並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論聯合政府”）蘇聯共產黨的歷史經驗也曾指明：

“爲要勝利，就要保證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民經濟間的結合，其方法就是極力發展城鄉間的商品流轉。”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農村市場是聯繫工農業生

農村經濟生活沿着社會主義 的道路向前發展

要正確認識農村市場問題，首先必須了解農村經濟生活所發生的變化。那麼，近幾年來，農村經濟生活究竟發生了些什麼變化，這些變化的特點又是什麼呢？

一九五四年冬，各有關部門曾到各地農村進行了一些調查。我們在河南省太康縣時，該縣正在召開三級（縣、區、鄉）幹部會議，佈置統購統銷工作，縣的領導同志要各個小組研究一下，實行統購統銷一年多來，本鄉本村裏“多出了些什麼，少去了些什麼”？到會的千多個幹部，一致得出的結論，全縣有十大增加：

（一）農業生產合作社及互助組增加。組織起來的農戶，一九五三年佔總戶數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五四年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五。

（二）供銷合作社營業增加。一九五四年各區供銷合作社的業務約比一九五三年擴大了兩倍。

（三）信用合作社增加。一九五三年只有八個社，一九五四年發展到一百〇六個社。現在百分之七十的鄉已有信用社了。許多信用社已經完全能夠負擔起本鄉農民的信貸工作，有的社裏存款還貸放不完。

(四) 幹部与羣衆的社会主义覺悟提高。大批互助組紛紛要求轉成生產合作社。

(五) 積極分子增加。一九五四年夏糧統購超額完成了任務，並出現模範鄉三十七個及售糧模範二千八百五十五人。

(六) 生產勁頭增加。一九五四年全縣新添糞池九千五百五十個，廁所二千四百〇二個，新添豬圈一千二百九十六個，農民積極積肥增產。

(七) 驢馬增加。僅各鄉信用合作社貸款組織農民購買的牲口就有二千多头。

(八) 大件農具、新式農具及大車增加。新添新式農具和大件農具五千四百四十九件，大車一千六百二十六輛。

(九) 新瓦房增加。一九五四年全縣新蓋瓦房一万四千三百七十六間。

(十) 穿新衣服的增加。農民說：“現在趕集的人，穿的都像辦喜事的一樣。”

還有五大減少：

(一) 買賣土地減少。一九五三年全縣買賣土地者五千八百〇三戶，計一万四千六百九十四畝，一九五四年減為九百五十九戶，二千七百一十四畝。

(二) 囤糧戶減少。一九五三年有一千一百七十六戶囤糧，一九五四年只有四十八戶了。

(三) 僱工減少。一九五三年全縣僱工者八百五十六戶，一九五四年減為五百七十戶。

(四) 出租土地的減少。一九五三年有二千二百六十二戶

出租土地，一九五四年減少到一千九百六十五戶。

(五) 投机商販減少。一年來市場物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平穩了。

其他地區也有類似情形出現。如河南陝縣薛店鄉農民說，統購統銷帶來了“七多、四快、三少”。七多是：牲口多、農具多、水車澆地多、用肥料多、信用社多、生產社多、新房子多。四快是：化學肥料銷售快、建築材料銷售快、腳踏車銷售快、棉布銷售快。三少是：高利貸少、買賣土地少、二流子懶漢少。浙江紹興新鑑鄉農民說：糧食統購統銷有十二個好處和四個不利。十二個好處是：支援工業好、支援解放台灣好、支援災區人民好、物價穩定好、促進互助合作好、增加生產發展生產好、節約糧食減少浪費好、削弱資本主義好、銀行優待儲蓄好、改善生活好、合理供應好、節省工夫好；四個不利是：對地主和富農不利、對美、蔣不利、對投机奸商不利、對老鼠不利。這些都說明總路綫宣傳貫徹後廣大農村發展變化的新面貌。

即在災區，由於我國社會制度的優越性，除部分工作基礎及主觀努力較差的地區外，受災農民的生產與生活也是恢復得相當快的。而且在嚴重的災害作鬥爭中，更加密切了農民與黨和政府的聯繫，提高了災區農民的覺悟程度，進一步鞏固了工農聯盟；甚至許多重災區，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也仍然生氣勃勃地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如一九五四年湖北省遭受了百年未有的大水災，秋後，許多國營商業幹部過低估計了災區農民的購買力，後來却紛紛追加了進貨計劃。沙洋、隨縣、巴

东、老河口、浠水等地百貨公司，对毛巾、襪子、圍巾、毛綫、火柴、金筆等一百多种商品都追加了要貨計劃，咸寧要貨計劃追加了五倍，監利追加了八倍，孝感追加了十二倍，新洲商店十月份要鉄釘十二桶（災民修蓋房用），後來取了一百四十桶，还是不够。說明受災農民在党和政府領導下，積極生產自救、重建家園，生產和生活的恢復是相当快的。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五年一月，湖北又遭受了兩次大寒潮。第一次寒潮襲擊時，全省被大雪压倒損壞的房子有七三七、六七三間，但当第二次寒潮襲擊來時，已經修好六八六、七六二間。兩次寒潮期間，政府撥口糧救濟款及修建房屋款二千多万元、耕牛草料補助款一百多万元，組織十七個縣到非災區寄養耕牛七万头；並在災區發放棉衣褲一百五十万件。災民感激地說：“共產党真正做到了雪裏送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大的水，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大的雪，也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共產党！”

再如江苏省江浦縣也是重災區，災後情况非常嚴重，但在党和政府的領導下，開展了生產自救運動，終究做到了沒有凍餓死人，也沒有造成流離失所的現象。而且还發展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培养了許多積極分子。據該縣二十四個受災鄉統計，災前只有農業生產合作社四十一個，到年底已有一百三十五個，組織起來的農戶由百分之三十六增長到百分之六十五；災前只有一個信用合作社，到年底發展到十三個，並還有七個信用組。又據七個重災鄉統計，通过生產救災工作，共培养了積極分子四百五十八人，其中有建党对象五十四人，建

团对象六十五人。

在國家工業化建設和糧食、油料實行統購統銷後，曾有一些人說：“共產黨的政策變了，政府只關心工人，不關心農民了！”“農民的生活很苦，种田人連飯也吃不飽！”“農民的生產情緒低落了！”“工農聯盟受到損害了！”等等，從上述災區與非災區的農村情況証明，這些說法完全不是事實。相反，我們看到，農村是欣欣向榮的，農民的生產情緒是高的，工農聯盟是鞏固的。在黨與政府的領導、幫助下，農村裏所增加的，是“生產發展”、“生活改善”，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增長；農村裏所減少的，正是那些不利於廣大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廣大農民正朝着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所指引的方向，也就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大踏步地前進。

但是，近一年多來，我們也確實聽到一些農民有些不滿的意見，從農村探親回來的工人、幹部也有不少反映，聽起來，似乎農村裏的問題也很多，這也是總路綫宣傳貫徹以前所沒有的情形。

一年多來，農民意見多的原因，除由部分地區在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未能切實貫徹自願、互利原則，甚至發生強迫命令的錯誤，並在處理有關社員實際經濟利益問題時照顧不週，以致引起部分農民對合作化的懷疑和誤解以外，主要就是因為農村市場發生了急驟的變化所致。現在，我們就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開始及實行糧食、油料統購統銷以來，農村市場變化中的幾個主要方面，來談談這個問題。

農村裏的新問題——“供不應求”

一年多來，農民有些意見，農村裏問題較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於農村市場許多商品“供不應求”的現象迅速發展的緣故。

解放以來，我國農民經過了土地改革運動，消滅了封建剝削，分得了七億畝土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繳納的約六百億斤糧食的地租；農業生產獲得了迅速的恢復與發展，如一九五二年比一九四九年，糧食產量增長百分之四四點九，棉花產量增長百分之一二〇點五，黃洋麻產量增長百分之四六五，烤菸產量增長百分之三五三點六，甘蔗產量增長百分之一六八點四，甜菜產量增長百分之四三九點六，花生產量增長百分之八二點五，油菜籽產量增長百分之三六點六；各種農產品收購價格，歷年也有所提高，農民購買力迅速增長起來。

一九五三年後，農民的購買力除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繼續提高外，而且還有了比較突出的高漲，這是因為：

（一）由於總路線的宣傳、貫徹和糧食、油料實行統購統銷，使許多農民把原來束縛在搞生意、囤糧、僱工、買地、放債等方面的巨大財力解放出來，變成爲正常的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購買力了。例如河南省太康原是箇餘糧縣，但在宣傳貫徹總路線和實行糧食、油料統購統銷以前，由於私商與富農

的投机活動以及農民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作祟，糧價不斷上漲，許多農民熱中於囤糧、搗糧（有一個解放後才翻身的農民，竟囤糧四万多斤），到一九五三年青黃不接時，麥子市價漲到二角四分一斤（牌價八分），糧食公司每天拋售幾十萬斤糧食，還是打擊不了黑市，後來連紅薯也漲到一角四分一斤，使得貧困農民有的不得不賣地買口糧，結果大家都不能安心过日子、鬧生產。當時牲畜價下掉二分之一還很少有人要，木料、磚瓦、傢具等都猛烈掉價，甚至連原來暢銷的油餅，這時也要賒銷才有人要。而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以後，糧價一直穩定，也沒法再囤糧投机了，“買牲口不如買地，買地不如放債，放債不如囤糧”等一類自發勢力的“術語”迅速消失，“不務正的人都務正了”，大家都能安心过日子、鬧生產了。因此，一九五四年一至三季度，供銷合作社就銷了三萬四千五百五十七把麥鏟，而一九五三年全年只銷了兩萬零七百五十三把，還要賒銷；一九五四年一至三季度銷了掃帚（掃場用）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三把，而一九五三年全年只銷了兩萬零九百五十三把，也還是賒銷的。生活資料的消費也比統購統銷前顯著增長，一九五四年一至三季度和一九五三年同期相比，縣百貨商店銷售的玻璃增加了一點三倍，自行車增加四點六倍，襪子增加兩倍，衛生衫增加四點六倍，被單增加八倍，顏料增加十倍，煤油增加了五點二倍，縣花紗布公司銷售的布疋也增加了七點二八倍。

（二）農民出售的產品比統購統銷以前增多，價格也比過去提高，而購買日用工業品反而比過去便宜。如糧食，在統購

統銷以前，農民一般是“爲買而賣”的，需用錢的時候，才賣一些。現在則除了按照統購標準自留的糧食（口糧、飼料、種籽、機動糧）以外，幾乎全數出賣給國家了。糧食浪費的現象亦大大減少。如太康五區窪子村一個姓王的農民（單身漢），一九五二年自產糧食五百斤，一斤未賣，但因浪費，到第二年春天還向別人借了二百斤才渡過春荒；糧食統購後，他知道不好再向旁人借了，不敢浪費，一九五三年雖仍然只打五百斤糧，不僅够吃，還賣了餘糧五十斤。全國農民減少浪費，節約餘糧出售，數目就大了。同時，國家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以後，交通日益發展，城市、工礦區及出口對土、副產品的需要增加很多，農村土、副產品的銷路擴大（如一九五四年僅國營對外貿易增加出口的土特產新品種，就可以換回五萬噸肥田粉），農產品價格提高（一九五四年與一九五二年比較，小麥價格上提百分之八，大米上提百分之六點五，生豬上提百分之二十八，雞蛋上提百分之二十一，黃花菜上提百分之三十九，甘草、大黃等十四種中藥材上提一點三六倍），工業品價格的下降（一九五四年與一九五二年比較，棉布價格下降百分之三點四，食糖下降百分之十四點八，煤油下降百分之十六點三，食鹽下降百分之三點一），因而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

（三）宣傳貫徹總路綫，實行統購統銷後，農民買賣東西絕大多數都通過供銷合作社，大大減免了商人的中間剝削，出賣的東西所得增多，買進的東西比以前便宜，從而提高了購買力。如湖南益陽十二區的農民算了一筆賬，一九五三年全區出賣給國家四三〇萬斤糧食，每斤比往年新穀登場時私商的收購價高

二分錢，共多得八萬六千元；全區向國家買糧二〇八萬斤，每斤比一九五二年私商銷售價低四分錢，共計少支出八萬三千二百元；一進一出全區農民由於減少中間剝削得到的利益達十七萬元，折合糧食約二百萬斤。河南太康明光鄉一個人民代表說：“我區合作社沒有經營生產資料以前，私商賣麥鏟要九角錢一把，桑杈九元一個，石槽十五元一個。後來合作社來了貨，麥鏟只賣四角錢，桑杈只賣四元五角，石槽又大又結實，也只賣九元一個。這些好處，再加上糧食、布疋、煤油、食鹽、紙烟等各種東西的優待，幾年來合作社給我一家人節省下的錢，至少可買一條牛！”根據前福建省財經委員會的調查，統購統銷後，南平縣許多鄉村幹部（都是不脫離生產的農民）的家庭，一年來因為減免了商人的中間剝削和參加互助合作等，所得到的利益，每家達五十元左右。糧食統購統銷，國家不僅不賺錢，反而貼賠大量的運費（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糧食年度，國家貼賠的糧食運費達二億多元）和管理費等，這些費用也間接地變成了農民的購買力。全國五萬萬農民買賣之間減免了的中間剝削及得到國家給予的利益，數目是很大的，這樣也就大大地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

其他，如一年多來農村信用合作社大量發展，使許多農民減免了高利貸的盤剝；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產量一般提高百分之十至十五；許多地方興建巨大的工業、交通、水利工程，吸收了大批農民參加工作（如據陝西中共略陽縣委會反映，由於農民參加修鐵路，該縣農民購買力提高了五倍，現每戶農民都有三、五百元，甚至千元以上的積蓄），並使許多農村“連沙

土、石头也都變成錢了！”所有这些，都增加了農民的收入。

而農民生產發展、生活改善、收入增加以後，政府並沒有增加農業稅或其他捐稅，相反，還在農業貸款、水利建設、社會救濟等方面繼續予以幫助和照顧，使我國農民过着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自由、幸福的生活，正如許多農民所說，現在過的是“物價穩定，生產發展，負擔減輕，生活改善，白天可以不操心，晚上能睡安寧覺”的好日子。

由於以上各項原因，使廣大農民的購買力在恢復時期原已普遍提高的基礎上更加迅速地增長起來。據前中南各省財委副主任會議估算，中南地區一九五四年雖遭受百年來未有的大水災，但一九五四年全區農民購買力仍不低於一九五三年，並還稍有增長。一九五四年安徽、江蘇也遭受相當嚴重的水災，但據前華東行政委員會商業局統計，安徽、江蘇兩省農村購買力仍比一九五三年上升百分之十以上。其他非災區農民購買力上升的情況更是可想而知了，如中共山西解虞縣委調查報告中說：“隨着合作化運動和生產的發展，農民生活大為改善，日用百貨和布疋的銷售總值，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三倍以上”。這種情況迫使農村市場商品供不應求現象很快發展。例如，一九五三年以前，百貨在農村中銷售得並不暢快，但一九五四年却開始出現了緊張局面，許多百貨商品相當普遍地脫銷，煤油更是顯著。一九五三年在農村中銷售煤油，還要“宣傳動員”“大力推銷”，但一九五四年，全國煤油的銷售量比一九五三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煤油主要銷售在農村中），廣大農村還都相當嚴重地發生了煤油脫銷的現象。